



外研社学术文库·翻译研究



巴别塔揭秘： 同声传译与认知、智力和感知

THE HIDDEN SIDE OF BABEL

Unveiling Cognition, Intelligence and Sense
through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阿根廷) Laura E. Bertone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外研社学术文库·翻译研究 ▶

巴别塔揭秘： 同声传译与认知、智力和感知

THE HIDDEN SIDE OF BABEL:

Unveiling Cognition, Intelligence and Sense
through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阿根廷) Laura E. Bertone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 01-2008-2432

© Copyright © 2006 by Laura Bertone

This edition is only available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Translation from Spanish: Enrique Robert.

(*En torno de Babel* by Laura Bertone, Hachette, Buenos Aires, 1989, included in the first three parts of this book).

Chief Editor: Mónica Nosetto.

Interior design: Mónica Nosetto.

Illustrations: Alain Huré(France).

Additional illustrations: Alejandro Barros (Argentina).

Image digitalization: Federico Kuntscher from Arka Digital.

First Edition in Argentina, 2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别塔揭秘: 同声传译与认知、智力和感知: 英文/(阿根廷) 贝尔托内(Bertone, L. E.) 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8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ISBN 978-7-5600-8529-6

I. 巴… II. 贝… III. 口译—研究—英文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4369 号

出 版 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车云峰

封面设计: 袁 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29.25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8529-6

* * *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85290001

跨学科研究目前已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的一种趋势。跨学科研究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可称为简单借鉴，即某学科借用其他相关学科的术语或概念作为本学科的学术话语，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新兴学科；第二阶段可称为深度借鉴，即某学科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第三阶段可称为相互借鉴，到这个阶段，不再是单方向的借鉴，而是双方向的相互借鉴，即某学科借鉴相关学科理论后，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

对人类认知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认知科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领域。虽然从认知角度进行的跨学科路径的口译研究自1986年意大利的里雅斯特（Trieste）口译研究大会后开始成为口译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但对于口译研究这门新兴（子）学科来说，这种研究主要着眼于探索口译过程及译员的认知运作，目前尚处在跨学科研究的第一阶段，正在向第二阶段迈进。劳拉·贝尔托内（Laura Bertone）于2006年出版的新作《巴别塔揭秘：同声传译与认知、智力和感知》为口译认知研究的跨学科路径作出了新的探索。

劳拉·贝尔托内是巴黎大学的语言学博士，从事跨文化研究及普通语义学（general semantics）研究，并拥有20余年国际会议传译的经验。在《巴别塔揭秘——同声传译与认知、智力和感知》这部新作中，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角，从国际会议口译的实践中撷取典型例子，试图探索并解释人类的感知、认知及智力的机制，尤其是人类语言交际的外在特点和内在机制，即，“巴别塔隐蔽的一面”（the hidden side of Babel）。

全书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信息与内容：译员所言”；第二部分：“译员发挥的作用：译员之行”；第三部分：“同声传译的工作机制：借用跨学科成果的解释”；第四部分：“内部探索：译员工作的内在机制”；第五部分：“巴别塔的重建：综述及结论”。

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的目的有四：一是通过对同声传译的研究，揭示人类语言的认知运作；二是启发研究者发现新的研究视角，指出认知研

究往往忽视的一些方面；三是希望读者读完本书后，会觉得不仅知道得多了，而且知道了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四是探索对人类语言认知现象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跨学科研究的方式，在目前看来，如要包容与语言相关的感知、感觉、感情、思想、表征、思维等现象的研究，仅仅靠语言学是不够的，而应该综合各种与认知相关的学科。

语言不仅是交际的“桥梁”，而且构成了人类对现实世界认知的本身。然而，语言不一定时时都起着“桥梁”作用，有时也会对交际沟通起阻碍作用；语言不一定时时都对人类的认知起建构作用，有时也会起解构作用。正因为语言如此复杂、如此丰富、如此神秘，它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人类认知的一个绝妙对象。

本书的研究起点与其他的一般语言研究著作不同。本书所依据的是对现场会议口译的语言互动和交流是如何达成或者失败的探索，尤其是同声传译员如何“实时地”传译他人的话语。作为会议口译员，几乎每天都在做着语言转换的事情，而且，实际上，他们转换的不仅仅是不同的表达方式，更是不同的认知世界的视角。因此，他们往往会对语言现象有着更深的认识。

在日常的语言交际中，由于交际方式的透明性和普遍性，人们对于其中所隐蔽的认知机制往往浑然不觉；然而，对于同传译员来说，由于他们的语言转换和表达面临着时间及空间的压力，通过透视他们的工作过程，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发现其语言交际的认知运作过程。作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通过对同传译员的口译话语与发言人的源语的偏离、不同和有差距的片段的采集、比较、分析，进而发现背后起作用的认知机制。这些“异常”现象正如一面放大镜，对其认知机制的研究恰恰能够揭示常态的语言交际背后所隐蔽的认知机制。

为达到其研究目标，作者充分借鉴了跨学科的成果，包括语言哲学、语言学、认知科学、心理语言学和实验心理学、翻译研究和口译研究、普通语文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

本书第一部分“信息与内容：译员所言”，包括第1—7章，内容有：语言如游戏；话语意义——从一面到另一面；话语的隐含义；话语动机；自相矛盾的信号；认知过程的两轴；认知运作的同时性等。

语言如游戏。语言的意义往往是变动不居的，意义往往是相对的。即使是很简单的句子，如“我买了报纸”，在不同的场合中也可能具有诸多的意义，尤其是不同的隐含义。以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奥斯汀（Austin）及瑟

尔 (Searle) 的言语行为视角来看, 同样一个直接言语行为, 在不同的场合中也往往可能蕴含诸多不同的间接言语行为。通过比较常态的语言行为和口译中的言语行为, 作者得出以下结论: 1. 不同的言说方式可能产生不同的意义; 在口译中不仅应考虑发言人所言, 还应注意其言说的方式; 2. 同样的言说在不同的场合中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 在口译中, 译员所了解的场合知识越多, 口译往往越到位; 3. 言说的风格不一样, 意义也可能不一样; 在口译中, 译员要注意传达源语的言说风格, 以便产生相同的言说效果。

译员在口译过程中是如何把握本来变动不居的意义呢? 译员主要参照以下参数: 发言人是谁? 听众是谁? 在何时? 在何地? 为何如此言说? (即五个W) 在口译过程中, 译员首先要做的事情往往是推定其尚未把握的参数, 从而把握发言人言说的意义。由此可见, 译员在口译现场的“在场”(presence) 亦是决定口译成败的重要因素。然而, 译员的在场及译员角色的“凸现”(intrusion) 应把握好适当的尺度。

即使是在日常语言交际中, 我们也能体会到, 话语的含义往往不只是在字面。在翻译中亦是如此, 双语之间语词的对等不等于信息的对等, 形式的对等也不等于内容的对等以及效果的对等。译员作为源语与目标语交际的中介, 置身于现场异语双方语言交际的中枢位置, 更能深切体会到话语意义的隐含层面。话语的隐含义主要有两类: 一是逻辑隐含义(logical implicatures), 包括语词本身的隐含义和话语行为的隐含义; 二是心理隐含义(psychological implicatures), 包括: 心理活动在话语层面不自觉的呈现(如口误)所产生的隐含义、对话语风格的有意识操控(如使用反讽语气)所带来的隐含义、修辞隐含义等。另外, 话语所附带的重音、强调、语调等都可能给话语加上新的含义。

如前所述, 要翻译发言人A刚说出的源语句子n, 译员同时考虑到: A于时间t、地点y就话题x对其听众B说出了这个句子, 译员根据自己对以上因素的考虑形成假设h, 进而以此为基础理解句子n的意义并把该句翻译成目标语句子n'。在上述诸因素中, 发言人的话语动机亦是构成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译意不译词”(Do not interpret what the speaker says but rather what he means.) 是口译中一条众所周知的原则, 尤其是对于初学口译的学生来说, 教师往往会要求“忘掉语词, 想想发言人的意思是什么”。然而, 当我们把发言人的话语动机引入意义的视域后, 再重新审视这一原则, 也许会反思其问题所在: 首先, 我们如何知道发言人的意思是什么? 用哪些参数来衡量? 其次, 这一原则是否意味着译员必须把发言人所隐含的意思明晰地说出

来呢？另外，从话语风格的角度来看，这一原则似乎也站不住脚。例如，源语发言人极尽迂回曲折、委婉表达之能事说了一段话，其目的就是要拒绝对方提出的要求，译员当然听出了他的意思，可译员是否能把源语简而言之地译为“某某代表的意思就是要拒绝”呢？当然不行，因为一旦这样译出，听众肯定会觉得源语发言人的话语风格是直截了当，而这种印象与源语迂回曲折的委婉风格大相径庭。

另外，发言人的话语中有时会出现前后分歧或自相矛盾的信号。对这种情况译员是怎么处理的呢？作者的发现是：首先，译员的主观愿望是，充分理解发言人的意思并希望自己所译出的意思被听众充分理解；其次，译员在翻译表达中，会注意追求表达的逻辑一致性；再次，如果出现了把握不准源语的意义及其逻辑线索的情况时，译员一般会选择暂时性的沉默或者省略，而不是以讹传讹；另外，在面临源语信息过于密集、语速过快或者源语信息中出现明显自相矛盾的情况时，译员作出的翻译决策一般基于这样两条原则：一是译出主要信息，压缩和省略次要信息；二是注意保持目标语表达的逻辑性。

实际上，在译员对源语进行理解并译出的过程中，有两条轴线的认知机制在同时发挥作用：一条是共时的认知轴（the synchronic axis）；另一条是历时的认知轴（the diachronic axis）。通过共时的认知轴，译员同时对不同性质的多种认知元素进行理解，包括上文所分析的源语的语词片断、发言人的行动和表情、现场的场合信息以及发言人在讲话的同时所展示的幻灯片等。通过历时的认知轴，译员能够把现场的认知信息和其记忆中相关的认知信息联系起来，从而理解现场的话语意义和发言人的意思。

正是由于两条轴线的认知机制的同时作用，同传译员才能够成功地对源语的显性义和隐含义、对发言人的话语意图和交际目标形成正确的理解假设，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分析和预测，进而做到成功的传译。

第二部分“译员发挥的作用：译员之行”，包括第8—14章。第8—9章对第一部分的内容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概述了已得出的初步结论。第10—14章的内容分别为：口译策略；口译中的期望和预测；会议口译的礼仪形式；会议场景的作用；译员的立场等。

口译策略是体现“译员之行”的主要方面。在第10章，作者通过示例和分析，揭示同传译员常用的口译策略，包括：1.把正在传译的片断与已传译的和即将传译的片断联系起来，把传译的语段与发言人的话语主题和主旨联系起来，把现场刚听到的信息与记忆中的已知信息联系起来，把正在听到的

信息与正在看到的信息联系起来；2.碰上暂时无法理解或明显前后矛盾的源语片断时，往往采用沉默或等待新的信息补充的策略；3.在上述情况下，如果话已说出一半而无法选择沉默或等待策略时，译员倾向于把话说完，保持目标语表达在形式上的完整；4.当信息负荷过重（如源语的语速太快、内容太难）或精神过于疲劳时，口译往往由具体转向笼统；5.在同传中需要争取时间时，译员往往会采用把间接表达转译成直接表达的策略；6.在传译过程中，由于源语的结构和语义并非受译员的掌控，因此，译员在语言表达形式上采取灵活顺应的策略；7.在个别情况下（如发言人讲一个笑话时），译员可能选择传译言语效果而非言语意义的策略。

在第11章中，作者分析了同传译员是如何在口译过程中进行期望和预测的。首先，如前文所述，译员在口译过程中对以下参数的推定能够为译员的理解和预测奠定初步基础，这些因素包括：发言人是谁？听众是谁？在何时？在何地？为何如此言说？其次，在对源语初步理解的基础上建立的语义场（semantic fields）能帮助译员把握发言人言说的意义并确认预测。当然，虽然同声传译过程中适度的预测是必要的，但要注意避免思维定式（stereotypes）的消极影响。

人类交际的规则与各种人群的文化和习俗密切相关，几乎每一种交际行为为都有相应的礼仪形式镶嵌于其中。本书的第12章讨论了会议口译的礼仪形式。礼仪可被定义为支配正式交际场合的一套规则，礼仪意味着某种行为模式的系统化重复。礼仪形式本身就附着意义，译员掌握各种口译场合的礼仪形式知识有助于自身准确地评估发言人言说的主旨含义。另外，正如人类用礼仪形式来组织交际行为一样，人类用于交际的语言也因不同人群的文化背景而表现为不同的语言程式。例如，在某些语言中，某些词语的重复就是—定场合中礼仪形式的体现。

译员对意义的认知不是单纯靠听辨和理解发言人的语词得来的，人类在交际中对意义的认知亦同此理。首先，人往往采取的是整体认知的方式，这种方式意味着听的一方不一定要听到/听清说的一方的每个语词才能理解其意义，采用类比、比较和联系的办法，人往往可以通过意义的一个部分推测意义的另一个部分，可以通过部分意义推测全部意义。其次，正如译员通过对会议场景各要素及要素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就发言人的言说意图和意义作出推断一样，认知场景也能够为语言交际中的各方提供认知“脚本”（scenario; script），便于其推断言说的意义。

第14章讨论了译员的立场所涉及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目前从社会学角

度进行的口译研究中探讨的热门问题，因此，作者在本书中没有也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答案。作者提出的问题包括：译员是否在任何时候都应与发言人的身份认同一致？译员在口译现场的身份是否像联合国官员评论（“今天的译员干得不错，我们都没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中反映的那样“透明”？译员传译过程中在目标语表达方式的选择上似乎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其又必须始终忠实于源语发言人，这是否意味着一个两难选择呢？

第三部分“同声传译的工作机制：借用跨学科成果的解释”，包括第15—20章，内容分别为：感知整合；联想网络；认知干扰；口译失误等。

心理学及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显示，人的听觉和视觉感知均遵循抽象及简化的原则，即对事物的结构性特征进行整合从而认识事物的整体，而不是把事物的所有细节不分主次地累加在一起。译员的口译同样符合这一原则。例如，在发言人源语发布的逻辑关系不够清晰时，译员往往会把逻辑关系加以理清，并有意识地把握其中的主干信息；在同传中由于源语发布语速加快而让译员不得不加快语速甚至压缩目标语表达时，译员会有意识地保留主要信息而去除次要信息。由此可见，感知整合（perceptual integration）是人类语言交际中一个典型的认知特征。

人对事物的整体性认知主要是通过建立感知的“联想网络”（networks of associations）来进行的。一方面，人在认知过程中会理清所感知到的各种元素之间的关系（如相同、相似、相邻、对比、相反等），建立整体性的意义网络；同时，又不断根据感知中新涌入的元素对已建立的关系和网络进行修正。同传译员的工作过程亦是如此：一方面以感知整合的方式建立一种“从上往下”（top down）的整体性的意义网络；另一方面又始终通过敞开的感知之门不断接纳新的感知元素，以一种“从下往上”（bottom up）的方式对已建立的意义网络进行修正。这样，同传译员就能避免按源语字面“死译”或是完全按自己的臆测“乱译”。

译员在同声传译的过程中面对的一个最大的困难是来自于内部和外部的干扰（interference）。对此，相关学科能提供些什么解释呢？如果干扰产生于两种语言之间，这属于“迁移”（transfers）的情况；如果干扰产生于一种语言之内，这属于“失误或口误”（lapses or slips of the tongue）的情况。产生于两种语言之间的干扰与讲话者母语或其他主导性语言的语音、词汇、句法、语义及语用的规则密切相关，产生于一种语言之内的干扰与共时的（感知）或历时的（记忆）多种认知信息元素之间的冲突有关。

同声传译中偶然的失误是难免的。口译失误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外部的压力,如源语信息过于密集、源语发布语速过快、源语的理解难度太大以及同传设备出现问题等,都可能给译员造成认知负荷上的压力而导致口译失误;二是内部的原因,如译员双语能力不够、主题知识欠缺、精神不够集中、身体过于疲劳等,都会导致同声传译中的失误。作者的观点是,以理性的头脑来看,失误是人类常态语言交际中一个必然存在的部分,我们必须正视它,口译失误也不例外。就口译来说,这意味着发言人在可能给译员造成认知负荷过大的地方应对其源语内容和发布作出适当的调整,也意味着译员不应耻于向发言人确认或请求重复,以免造成交际失败。

第四部分“内部探索:译员工作的内在机制”,包括第21—24章,内容为:认知的内在机制;意义的变量与恒量;理解过程;大脑内部等。

人类认知的主要方式有:感知、观察、联系、比较、区分、识别等,其中,比较、区分和识别都意味着对模式的认知。在随时进入人的感知的无数元素中,人往往会选择一部分加以注意,并在这些元素之间建立起关系,然后以整合的方式进行认知。在人类的高级认知方式中,人的象征能力(symbolizing capacity)、抽象能力(capacity for abstraction)和综合能力(capacity for synthesis)起着重要作用。人类认知的内在机制在同声传译的工作过程中有着显著的反映:首先,如前文所述,译员总要寻找几个基本问题的答案,即,发言人是誰?听众是誰?在何时?在何地?为何如此言说?其次,译员要注意对口译现场各种信息的感知和观察;然后,在整合上述认知信息的基础上,形成对源语意义的假设;最后,根据即时的新信息,对意义假设进行确认或修正,作出实时的传译。

多元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特征之一,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所说,“人无法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那么,人类是如何在这纷繁复杂的人类生活中进行感知识别、分门别类等理解和认知活动的呢?神经生物学家霍金斯(Hawkins)(2004)指出,“自然的进化解决了人类如何认知变动不居的世界这个难题,大脑皮层上自有代表恒量的机制”(Hawkins, J. 2004. *On Intelligence*. New York: Times Books)。如上节所述,人类的象征能力、抽象能力和综合能力使得人能够在面对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诸多变量(variance)时把握认知的恒量(invariance),进而做到对意义的理解和相互之间的交流。口译过程中的语言交际亦同此理。

理解是人类认知的核心。没有理解,人类之间的意义传递(尤其是语言交际)就无法实现。在口译实践中,没有理解,译员的口译就会成为机器一样的逐字硬译。理解是一种人类内部认知的动态过程,其主要特征是根据即

时感知的信息进行联系、比较、区分、综合、抽象和识别。另外，根据记忆中已有的信息和最新感知的信息进行预测和修正也是人类理解的重要特征。那么，是什么在影响译员的理解呢？影响译员理解的主要因素有：感知的信息太少或太多；关于五个W的基本信息不完整；错误地判断发言人的动机和意图；缺乏背景信息；对会议主题有错误的思维定式；外部或内部的干扰；发言人的信息自相矛盾等。

从脑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来看，人类认知的内在机制是具有生物学基础的。根据神经生物学家霍金斯于2004年发表的研究结果，目前我们知道的人类大脑皮层至少具有以下四个功能：一是以恒量形式存储认知模式；二是存储认知模式的序列；三是存储认知模式的层级；四是以自动的、联想的方式回忆认知模式。

第五部分“巴别塔的重建：综述及结论”，包括第25—26章，内容为：巴别塔的倒塌；语言运用和语言研究的新视域。

人们往往容易注意到不同语言之间交流时存在的障碍，而不太容易注意到同一种语言本身也可能会给交际造成障碍。举例来说，墨西哥总统福克斯(Fox)的一番言论曾在国际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事由是他曾说“即使是非洲裔美国人也不会干美国人提供给墨西哥人的某些工作”。这一言论被普遍认为有歧视非洲裔美国人之嫌，而他自己则坚持认为，他的话只是为了维护本国的人民，无意伤害其他种族的人。可事件的后果却使他陷入了“政治不正确”的尴尬处境。如此看来，巴别塔倒塌所象征的变乱不仅存在于不同语言之间，而且存在于同一语言之内。

在本部分，作者在综述本书前文结论的基础上，指出了研究人类语言交际及其认知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强调，从理论研究的视角来看，我们不应该把对语言问题的探讨局限于纯语言学的视野之内，而应把它置于更广阔的“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s)的跨学科视域中来进行研究。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人们有必要受到更多的语言认知、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训练。

语言是人类独有的认知和交际手段。语言的认知机制、潜力和局限等“巴别塔隐蔽的一面”尚有诸多问题值得人们去深入探讨。

本书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其跨学科的独特视角：以分析同声传译的工作机制来印证人类认知的原理，以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来解释口译现象。具备这一特点，本书不仅能为译员反思其会议口译活动提供指引，而且对于那些对人类认知活动及人类语言机制感兴趣的人来说也是一部视角独特的参考书。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全书始终在同声传译和日常语言交际及戏剧表演之间进行类比分析。具备这一特点,本书不仅对口译研究者和译员有参考作用,而且能为语言研究者开拓思路,为语言工作者拓宽视野。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虽为学术研究著作,然全书行文深入浅出,语言表达生动,并配有大量现场的例子及形象的插图。具备这一特点,本书对于语言研究者和口译研究者之外的普通读者来说,也是一本提高语言交际能力的平易而又实用的参考读物。

本书的美中不足之处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本书提出了口译研究、语言交际研究和认知研究方面的诸多课题,然而,对于不少课题的探讨尚不够深入。这体现在一个明显的特征上,本书共26章,除去其中4章属总结综述的性质,其他20余章均涉及不同的课题,但不少章节都篇幅过短,让读者有浅尝辄止、不够深入之憾。二是本书虽然探讨了不少课题,但是其论证方法大多属于传统的经验例证分析法,这无论是对于口译研究还是认知研究来说,都有欠缺科学性之嫌。当然,本书探讨分析的诸多问题只是得出了初步的结论和假说,这在一定意义上也为我国有关学界的有识之士进行实证检验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课题。

仲伟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斌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讲师、博士生

*To my mother,
with Teófilo.*

A Word of Thanks

Between the first publication of part of this book in Spanish (En torno de Babel – Estrategias de la interpretación simultánea, Buenos Aires: Hachette, 1989) and this first enlarged edition in English, sixteen years have gone by. There are now a few more people to whom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thanks. In the very first place, Enrique Robert, colleague and friend, former UN permanent interpreter whom I met at a conference in Phoenix, Arizona, in 1984 and who took me literally by the arm to the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ere I would eventually replace him as teach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for a whole semester the following year, in what constituted a great personal teaching experience for me. Once back in Chile, his homeland, Enrique took the time and the energy to translate this work into English and always remained confident that it would eventually get published. I want to thank him first for his work, since I had the feeling when reading his translation that I was really reading myself. But I also want to thank him for his trust, respect, and patience. I hope these words transmit my deep appreciation for that infinitely generous flow of letters and mails across the Andes that silently paved the way for this new book. Enrique, thanks!

Then, Mónica Nosetto who, without special previous experience in the interpreting world, but with a wide and rich experience in the editorial and literary world, proved to be a challenging, passionate and lucid reader. Mónica, thanks! Your help was not only fundamental, our exchanges were also frequently fascinating and fun!

But this work started long before, during Emilio Stevanovitch's interpreting classes in Buenos Aires towards the end of the sixties. Steve, as we used to call him, unveiled the interpreting world for me, as for so many other interpreters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Taddey Pilley, head of the Linguists' Club and one of the leading London interpreters at the time who, after listening to me in a short exam, insisted I should become a member of AIIC, the interpreters' association based in Geneva giving me thus the final thrust for an international career. I should not forget it was my good friend Roberto Devorik who found the connections for me to reach Taddey during a fleeting visit of mine to London.

My appreciation goes as well to Prince Antonin Andronikoff, for years chief Interpreter at the Quai d'Orsay, who welcomed me in his apartment on rue de l'Odéon on a warm summer afternoon of 1976 soon after my arrival in Paris. During what was to me a most fascinating conversation, he suggested my doing research in this field, revealing thus a possibility the existence of which I had ignored till then.

My gratitude goes especially to Gilles Fauconnier (Directeur de Recherche at l'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and professor at Paris VIII in those days) who became my doctoral tutor.

I would also like to recognize those first readers of my first French manuscripts who had the courage not to discourage me: Jean-Marie Flosch, Ned de Margerie, Jean-Francois Le Ny.

In quite a different period of my life and my research, I am indebted to Charlotte Schuchard Read, a long-life pillar of the Institute of General Semantics who, the first, suggested I should have this book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made availabl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pecial word of thanks to Stuart Jordan, astrophysicist from NASA and great humanist, who took the time and the energy to read a long manuscript and make a most interesting evaluation.

Thanks to my colleagues, especially those who kindly allowed me to record their work, and to all the others – old and young – from whom I always ended up learning something.

My acknowledgments to the authorities and technicians at UNESCO in Paris, and UNISYS in St. Paul de Vence for having permitted me to record some of their meetings.

To Ned de Margerie and Thierry Léfébure for proof reading the French texts. To Douglas Town, Lea Fletcher and Alejandro Parini for proof reading the English texts. Very especially to Alain Huré, and to Alejandro Barros for their illustrations. To Norberto Ruiz Diaz and Francisco Zabala for revising the phonetic transcripts. To Norberto again, to Victoria Massabulit and Susan Presby-Kodish for their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The thrust that decided me to embark on this adventure thirty years ago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desire to develop an academic or a literary career. As if trying to solve a personal puzzle, I was just following an intuition, pulling together pieces that had till then appeared to me as “disconnected”. The study of language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perspectives has been the unifying common thread.

Incredibly enough, the thrust of accepting this challenge in the past proves to be valid still today. I am surprised at my own enthusiasm to update and complete this work in the light of other more recent experiences. In fact, some time after its publication in Spanish, I slowly started shifting my attention and changing activities. It is the result of these other perspectives, and the renewed vision of the old research that I wish to bring to the readers’ attention today.

Laura Bertone

Buenos Aires, September, 2006.

Prologue

As many authors have indicated,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that support the produc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 although taken for granted in everyday life – are extraordinarily subtle and complex. Linguistics, pragmatics, psychology and neuroscience have hardly begun to unravel some of their mysteries. How is it then that the author has had the audacity to write a book about the most sophisticated cognitive-linguistic skill that human beings are capable of –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No doubt, the answer lies partly in the fact that Laura Bertone does not deal with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from the purely academic perspective of a specialist in a certain discipline but draws on her own personal experiences as an interpreter and combines these, in a very coherent and original way, with an excell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most recen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work on language processing.

Laura Bertone's book is wonderfully lively and entertaining. But what I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here is how the combination of introspective data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led Laura to formulate an original and important hypothesis on language processing.

I need to go back to our first meeting in the 1980's when Laura was starting her PhD dissertation on linguistic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Gilles Fauconnier.

Laura told me then that she was convinced it was indispensable for her to learn about the experimental work on language production and understanding in psycholinguistics in order to carry out her thesis o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nd she asked me for the relevant references. This request sur-